

齐鲁名士

公元前647年，周天子以管仲攘戎扶周的助功，欲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谦谢道“齐国天子二守国、高在”，

只接受下卿之礼，可见高偃在齐国的崇高威望和其重要的地位。

高偃：春秋首霸背后的忠贞之臣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姜健 张继才

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白兔丘村，位于临淄城区北部约十公里处，淄博的母亲河淄河从村东流过。沿着河西岸一条土路南行，几分钟后，一个绿植环绕的院落里，出现了一座郁郁葱葱的“山丘”，高大的汉白玉石像、密密麻麻的碑林、路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都在告诉世人，这里就是高偃墓。

高偃，字白兔，谥号敬仲，又称高子，春秋时期齐国上卿。他身历四朝，拥立了两位齐国国君，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首霸大业，是个在齐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忠贞之臣。

监国上卿明大义
辅佐小白成国君

高偃，生于公元前728年，是春秋时期齐国缔造者姜太公的后代，属于齐国的贵族。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当时周天子赐封的齐国监国上卿，这是一个地位比后代宰相还要高的官职。《春秋左传杜注》记载：“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节，皆为上卿。”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上卿都由周天子任命，肩负着守国的重任，有点类似现在的中央特派员。这里说的高子就是高偃，国子则指国懿仲。

据史料记载，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无道，政令无常。因为担心遭到杀害，所以就由管仲侍奉齐襄公的二弟公子纠，去了纠母的国家鲁国避难。同样是为了避难，由鲍叔牙侍奉齐襄公的三弟公子小白，去了小白母亲的齐国莒国。

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在葵丘驻守的大臣连称、管至父，因为齐襄公不按照约定派人替换他们回都城怀恨在心，勾结同样对齐襄公怀恨在心的齐僖公侄公子公孙无知，策划叛乱。这年12月，齐襄公到姑蔑游玩，在沛丘打猎的时候，因为受到野猪的惊吓，从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脚。公孙无知和连称、管至父等人听说齐襄公受伤，便率领手下袭击了齐襄公的住所。将齐襄公杀害后，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

公孙无知更是昏庸，再加上自立之事名不正、言不顺，最终引起了公愤。自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5年春天，公孙无知到雍林游玩的时候，被雍林人偷袭杀死。

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孙无知死后，大臣们就商量着立君之事。潜心研究齐文化多年的高氏后裔高洪智告诉我们，依照周礼祖制，客居鲁国的公子纠是第一继承人，然而，齐国的使臣去了鲁国，并没把公子纠请回来，反而是带回来鲁国的一封信，大概内容是鲁国索要铜铁、匠工和土地若干等，当作鲁国抚养公子纠多年的报酬。

铜铁、匠工和土地，都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东西，身为监国上卿的高偃无权、也不能同意这件事。于是，他和国懿仲暗中安排使者去莒国请公子小白回国。鲁国听说以后，也派兵送公子纠回国，同时派管仲带兵，在莒国到齐国必经之路上堵截公子小白。两兵交战，管仲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假装倒地而死，随后躲在帐篷车里日夜兼程赶回了齐国，并在国懿仲、高偃两大齐国贵族的支持下成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而在得到管仲射中小白的“捷报”后，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队伍放慢了前进速度，六天后才到了齐国，此时小白早已成为国君。愤怒的鲁庄公和公子纠并不甘心失败，组织了大军向齐国杀来。在这紧急关头，齐国上下意见不一，有的要迎战，有的要迁都，危难时刻，高偃挺身而出，力主迎战，并亲自指挥大军，将鲁国大军打得溃不成军，使近万鲁军成了瓮中之鳖，迫使鲁庄公向齐国妥协，并满足了齐桓公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处死公子纠，交出管仲等。



中华高偃文化园里的高偃墓

改革治齐佐桓公
春秋首霸有其功

众所周知，齐桓公继位之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君臣同心，励精图治。而高偃在辅佐齐桓公继位之后，在辅助齐桓公和管仲进行改革治齐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史记·齐世家》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偃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贍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管仲治理齐国的一项重要内政改革就是实行了“叁其国而五其鄙”的政策。“国”就是国都及其郊区，“叁其国”就是把“国”划分成二十一乡，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国语·齐语》记载：“士商十五乡，公卿五乡焉，国子师五乡焉，高子师五乡焉。”高偃在齐国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鄙”就是乡村，“伍其鄙”就是规定三十家为一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设一大夫。全国乡村共分五属，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

内政改革之后，管仲认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的推荐、选拔和任用。按照规定，五大夫每年正月例行向齐桓公报告属内治绩，负责推荐贤能。官吏采用选举制度，推荐贤能，人才由乡长向上进贤、长官司徒考评、桓公亲自策向，称为“三选”。地方官吏如果没压制人才，治以“蔽贤”“蔽明”之罪。

齐国对于人才的考察、管理都有具体分工，职责明确，标准清楚。《管子·大匡》记载：“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师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还告诉高偃说：“工匠、商人，出人不顺于父兄，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违背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任用，好的给上赏，不好则官吏受罚。”《国语·齐语》则记载：“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里，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就这样，由高偃、国懿仲总管，齐国加强治理，层层负责，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

高偃是掌管齐国军政大权的上卿，在齐国军政改革、建立完整的军事体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齐桓公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乡师，卿也。国子、高子皆齐上卿，各帅五乡，为左、右军”。《管子·小匡》则记载：“国设三军，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

这样一来，齐国百姓就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团结居住，做到夜闻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齐国兵力迅速增强。

相机行事平鲁难
忠义存心留英名

高偃不仅对内主军、主政，对外也曾代表齐桓公安定鲁国之乱并称盟诸侯。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去世后，鲁国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战。鲁庄公的庶兄庆父杀死了鲁君公子般，立公子启为君，也就是鲁闵公。齐桓公二十六年，庆父又欲自立为君，派大夫杀死了鲁闵公，鲁国由此大乱，史称“庆父之乱”。齐国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慰问，仲孙湫回来后报告齐桓公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齐桓公二十七年冬，高偃奉齐桓公之命，带“南阳之甲”3000余人，到鲁国帮助安邦定国，拥立了鲁僖公即位，还帮鲁国修复了鲁国都城从鹿门到争门的城防，稳定了鲁国的政局。《公羊传》记载：“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存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犹望高子也。”“犹望高子”的典故就由此而来。

对此，《春秋谷梁传》评曰：“高子能深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以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鲁国遂安。由此可见，权在高子。高子之为人臣，忠也，从义不从命矣。”意思是说，高偃平鲁乱立僖公而安鲁，是奉行行事；但盟会以礼当是诸侯国君主间或由君主授权人的事，高子未得桓公授权“立僖公则盟之”，

与盟是违礼的。然而《春秋谷梁传》却没有指责他违礼，而称之为“因事制宜”，这样做对安鲁更有利，并能睦邻，是“从义不从命”之举。由此可知，高偃在齐国位之高、权之重，而其“深执忠臣之义”之心更甚，从而得到了桓公的信任、国人的拥护和历史的赞许。

公元前647年，周天子以管仲攘戎扶周的助功，欲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谦谢道：“齐国天子二守国、高在”，只接受下卿之礼，可见高偃在齐国的崇高威望和其重要的地位。

老骥伏枥显神威
再拥齐国立国君

齐桓公四十三年，高偃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本是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偏偏齐国又出现了动荡，历史再一次将他推到了前台。

这一年，做了43年齐国国君的齐桓公也已经73岁了，而且病得卧床不起，齐桓公晚年宠信的宦官寺人貂和厨师易牙心生叛意，派兵把守住宫门，对外只说是齐桓公要清静，不耐烦与人说话，不准任何人进宫问安。过了三天，齐桓公还没死，两人就把伺候齐桓公的宫人，不论男女，一概赶出来，在卧室四周垒起三丈多高的围墙，墙底下只留一个小口子，像狗洞一般。每到夜里派一个小丫丫头钻进去打探一下齐桓公的生死。最终，一代霸主被活活饿死。

得知齐桓公已死的消息，两人马上和齐桓公的长子公子无亏勾结起来，不顾齐桓公生前选定的继承人是三子公子昭，伪称齐桓公遗旨改立公子无亏为君，结果遭到了高偃的极力反对。由于高偃带头反对，朝中的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也都纷纷响应，集体抵制二人另立的公子无亏。寺人貂和易牙恼羞成怒，干脆实行兵变，直接在朝上指挥侍卫对大臣们进行攻击，十几个不服气的大臣被杀，还有不少人受伤。高偃由于威望太高，叛军怕引起众怒而有所顾忌，因此没有遭到毒手。

见势不妙，高偃只得另作打算。原来，齐桓公晚年虽宠信奸佞，但是在齐国，他最相信的还是当年把他扶上国君位子的上卿高偃，于是他就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公子昭托付给了高偃。当年葵丘会盟的时候，齐桓公就和宋襄公有过协议，一旦双方国内有叛乱发生，可相互帮助镇压，而当时，公子昭已经是定好的继承人。所以当公子昭不能顺利继承国君的时候，宋襄公就有义务帮助公子昭继承君位。于是，高偃安排公子昭出城向宋国求助，自己则在齐国作内应。

送走公子昭后，都城临淄并没有平静下来。齐桓公其他的三个儿子公子无亏不遵守王命而妄自己做国君，都不服气，奸臣开方听说寺人貂和易牙立公子无亏做国君，就对公子潘说：“太子昭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无亏凭什么做国君？难道你就不应当国君吗？”公子潘就和开方把早就准备好的家丁全部集中起来，占领了右殿，叫人通知各位大臣来这儿承认公子潘是国君。公子商人得知了这个情况，也赶紧跑过去跟公子无亏说：“我们都是先君的儿子，齐国的江山也有咱们的份，无亏和潘为了争做国君，现在打起来了，难道咱哥俩就不该做国君？我看咱们得赶快去占住左殿，通知大臣们来咱们这儿开会，或者你做国君，或者我做国君，谁打咱们，咱们就跟谁打。退一万步说，也得把齐国分成四份，各分一份。”公子无亏认为很有道理，两人就带上自己的家丁占住了左殿。霎时，哥儿四个你打我，我打他，他打你，乱哄哄地一齐开了打，一直打了67天。齐桓公的尸身发了臭，也没有哪个儿子去管。

这时，高偃实在忍不住了，他不顾劝阻，冒着生命危险，前去痛骂这四个只知道争国君位而不管父亲尸首的混账公子，这才把公子们骂醒，于是四个人又都去抢着给父亲发丧，结果又变成了四个公子抢尸首。最后公子无亏抢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他刚刚草草把齐桓公埋葬，公子昭就搬来了宋国大军。这时齐国四个公子才罢兵言和，决定先打退公子昭 and 宋军之后再来解决内部问题。

高偃听到公子昭搬来救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于是就设鸿门宴杀了寺人貂，然后召集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联合起来带兵攻打王宫，里应外合，把公子昭迎进城。

最后，易牙逃亡鲁国，人们将怒火烧向了公子无亏，公子无亏成了替罪羊战死，其他人投降。这次夺储之战，公子昭在高偃的帮助下成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后来的齐孝公。这也是高偃最后一次在齐国发挥他的影响力。



高偃画像

果又变成了四个公子抢尸首。最后公子无亏抢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他刚刚草草把齐桓公埋葬，公子昭就搬来了宋国大军。这时齐国四个公子才罢兵言和，决定先打退公子昭 and 宋军之后再来解决内部问题。

高偃听到公子昭搬来救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于是就设鸿门宴杀了寺人貂，然后召集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联合起来带兵攻打王宫，里应外合，把公子昭迎进城。

最后，易牙逃亡鲁国，人们将怒火烧向了公子无亏，公子无亏成了替罪羊战死，其他人投降。这次夺储之战，公子昭在高偃的帮助下成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后来的齐孝公。这也是高偃最后一次在齐国发挥他的影响力。

百姓众力堆坟墓
高氏子遍布四海

齐孝公六年(公元前637年)，高偃逝世，谥号敬仲，葬于齐国都城临淄以北十公里处。高偃墓东靠淄水，西临齐平原大道，南览齐都临淄，北临齐北接燕地之平原，以示来往燕、戎之商客，也表国人之敬畏。

由于高偃的一生对齐国以及整个周朝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帮助下，不仅立了两个齐国国君，还帮助鲁国立过国君，民众对他的评价甚高。据说，他的墓就是当年老百姓自发用衣服兜土堆起来的。

因高偃号白兔，故其墓也叫白兔丘。高偃乃天子命卿，在齐桓公时期，其权位仅次于国君，故去世后丧葬崇隆，驻有大批卫士护墓，这些卫士带家属定居墓北，世代相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村落——白兔丘村。据村碑记载，白兔丘村，“周代立村”。而白兔丘村所在的乡镇，也被人们称为敬仲乡。

1958年，敬仲乡被临淄县人民政府命名为敬仲人民公社，1982年又更名为敬仲镇，而高偃墓也早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中的重要墓葬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白兔丘附近还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高子戈”——当年高偃部队车战中使用的一种曲头进攻性青铜兵器，上有阴文“高子戈”三字，现藏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高偃是高姓、卢姓、柴姓的祖先。据《广韵》记载，姜太公六世孙齐文公的次子受封于高邑(今山东禹城，或说河南省高县、山东省邹平县东北)，称为公子高，也就是高偃的爷爷。高偃以他爷爷的封邑高为姓氏，他和他的一部分子孙于是就都姓高了。高偃后来因迎立齐桓公有功，被齐桓公赐食邑于卢(今山东省长清县西南)，所以他的部分子孙后代以卢地为姓，此为卢姓的由来。柴姓的高先祖是高偃的十世孙、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高柴，高柴的孙子柴荣，以祖父的名字“柴”为姓，世代相传。

高偃逝世后，其子孙世袭上卿之职，并兼守国之重任。春秋末战国初年，田氏代姜，高氏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完全丧失，高氏纷纷出走齐地，迁居到南越、楚国、鲁国、赵国等地，而渤海高氏已经成为当今高姓族群中最庞大的一支。

目前，据民间族谱统计，湘、鄂、川、赣、皖、滇、苏、豫等省都有明确记载为渤海高氏名人后裔的家族，粤东、港台和海外泰、马、新等地区和国家，均有高氏后裔生活。

如今，在高氏后人的努力下，高偃墓及周边已经建成了中华高偃文化园。2016年10月15日，第四届世界高氏宗亲会在中华高偃文化园举行祭祖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余名高氏后裔到场，共同缅怀这位在齐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先人。

·相关链接·

春秋高子戈出土纪实

□ 陈巨慧 张继才 崔立来

在齐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春秋时期青铜兵器高子戈，出土于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白兔丘村高偃墓附近，高偃后裔、中华高偃文化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高洪智是当年高子戈的发现者之一。

1970年春节前，高洪智刚好15岁。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学校放寒假的第一天，他和高洪俊、崔庆明同学三人一大早就凑到一起，到村东几十米外的淄河边玩耍。

正值腊月，河面早已结了冰，冰面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银亮的光，景色十分迷人。三人沿河崖堤坡而下，顺着河边走了几十米远，高洪智忽然被脚下一个看上去很稀奇的小物件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形似‘小贝壳’的物件，很好看，好像是实心的，拿在手上有一定的重量，用在砖面上划，能留下明显痕迹。”高洪智说。

这让高洪智他们三个感到很好奇，从小在淄河边上长大的他们，确信这个“小贝壳”绝不是淄河里的产物。好奇的高洪智又在小物件四周寻找着，试图发现它什么。很快，不远处崖壁上的一块异常泥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意识到“小贝壳”的来源应该就在这崖壁上，便起身向崖壁奔去，果真看到崖壁上有个似露非露、像个坛子一样的东西。

高洪智招呼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攀上崖壁察看，发现的确是残缺不全的“土陶罐”，而且陶罐还被几近风化的崖土盖住了大部分。露在外面的部分也已严重风化，残缺不全。从破损处能看到，里面还有不少“小贝壳”，和他手中的一模一样。他判断，手中的这枚“小贝壳”绝对是从此土陶罐中滚落下来的。

随后，他们找来树枝、瓦片等，用力把土陶罐挖了出来。由于陶罐早已风化，随着崖土的破碎碎成了几大片，罐子里的“小贝壳”也随着挖掘出的崖土散落了下来。他们三个还有些不甘心，就在陶罐四周继续寻找。

突然，一块看似不大的青色泥块引起了高洪智的注意，用树枝掘出青色土块，去掉外边的覆盖的泥土，一个连体的铜环出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个形似‘小贝壳’的物件，很好看，好像是实心的，拿在手上有一定的重量，用在砖面上划，能留下明显痕迹。”高洪智说。这块青色泥块，直径在5厘米左右，一头是小环，直径在3厘米左右，两环之间有四五厘米长的连接体，呈“O—O”型相接。随后，在我们三人的合力挖掘下，又还发现了6节类似的铜环，其中有一节铜环的大环还套在一枚骨头上。这时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意识到，这里可能是一个死人的墓穴。大家不由地有些毛骨悚然，我们毕竟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啊，在墓穴旁感到恐惧也是很正常的。

他们定了定神，稍作休息，本想抓紧回家，但好奇心和捡铜卖铜换零花钱的诱惑，驱使他们继续挖了下去。没想到，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他们又挖出了9件青铜物件，其中有一把没有剑鞘的青铜剑，被他们不小心从剑柄根部弄断了。

经过一个早上的挖掘，又累又饿的三人便急匆匆地收起挖出的战利品回家去了。在他们回家吃饭的时候，一个比他们小的孩子用镐头把宝剑的剑柄刨走了。

在他们挖掘的那些青铜器中，还有一件完整的器物，因为常从连环上看到一种叫“戟”的兵器，虽然这件东西不是“戟”的形状，但高洪智他们还是给它起了个“铜戟头”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此物件总长在20厘米左右，在直刃的侧面又延展出约8厘米的刃刃，铜戟头的宽面还有看不清的字迹。”

高洪智他们把挖掘来的那些“废铜”全部放在了高洪俊家，并商量好饭后一起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掉换钱。饭后，他们三人一同来到白兔丘收购站，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所有的“废铜”都放在了秤盘上等待收购员称重。“记得收购员的名字叫常兆禧，他并没有急着给我们称重，先是问我们从哪儿搞的这些废铜来卖，之后又问我们是谁人。我们毫无隐瞒地把事情的经过向他说了个究竟。老常也没多说什么，称重后给了我们5.97元钱。当时我们很高兴也很激动，也没有人去问是多重、价格是多少，接过钱就往回走。我跟高洪俊每人分了2.00元，崔庆明分得1.97元，三人都很高兴，毕竟发了个意外之财。腊月二十六是白兔丘大集，我用分得的钱买了一大盘馒头、两支最长的礼花，高兴地过了个不寻常的好年。”

至于他们从崖壁上掘出的那些“小贝壳”，高洪俊家大人以为，既然收购站不收购，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又因快到春节了，忌讳是死人堆里的东西，会给人带来晦气，就把它们都扔到村外的垃圾场去了。

“我从小就有个毛病，就是遇到好奇的事总想问个究竟，要不然就睡不着觉。这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从村外的垃圾场中又找回了几枚‘小贝壳’，在水里洗刷干净后放在了窗台上，本意是等有机会再让别人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后来听说我们村崔元良的父亲很有学问，我拿着它们来到崔元良的家。”高洪智说。

论辈分高洪智要管崔元良的父亲叫大爷爷，当讲述完发现“小贝壳”和那些青铜器的全部经过后，这位大爷爷接了他手上的“小贝壳”，仔细端详了好大一会儿说：“根据你说的情况，那些青铜器中像戟头的东西和那把剑

应该都是兵器，那些套着骨头的连体铜环应该是一种刑具或者是一种叫马嚼子的东西，至于那些铜套或铜箍样的物件，因为没见到具体实物，我也不好说是些什么东西。”

大爷爷又在手中掂了掂“小贝壳”说道：“这种贝壳来自于深海中，在先秦时期是用这种海贝来当钱用的，古书上称它是‘贝币’，这都是几千年的事了。”当时高洪智并不能完全听懂大爷爷的那番话，只是佩服老人家，觉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就这样，转瞬十载余。1986年10月的一天，高洪智和东营来的几位朋友到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参观，在展台上看到了春秋时代青铜兵器——高子戈。高洪智心里一阵狂喜：这不是当年我们三个同学掘出的“铜戟头”吗？“我看得非常仔细，文物下方的标签上清晰地写着：春秋早期兵器——高子戈，1970年出土于白兔丘村高偃墓附近。”

激动之余，高洪智自豪地对朋友说：“这件文物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朋友以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向他投来了疑惑不解的目光。

曾经担任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馆长的杨英吉回忆说，因为临淄地下埋藏着大量的文物，当时负责文物收集工作的临淄区文化馆，经常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废品收购站查看废品中有没有意外流出的文物，高子戈就是这样被从废品中发现的，工作人员还从收购员口中了解到了高子戈的发现经过。“一开始并没有发现铭文，拿回来清洗后文字才显露出来。”

1973年，临淄区文物管理所成立后，包括高子戈在内的文物全部被移交交给文物管理部门。1982年8月，经山东省文物主管部门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85年，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建成后，高子戈被放进博物馆，供世人欣赏。后并入齐文化博物馆。